

风云长为护储胥

——施蛰存创办《词学》四十年

刘效礼

对于办刊，施蛰存可谓老马识途、胸有成竹。在立志研究词学之初，施蛰存便致力于将传统词学改造成现代学术，融入现代社会科学，以促成现代词学的诞生。创办和主编《词学》可谓一大好机缘。

四十年前的七十年代末期，我国正在大力兴利除弊，万象更新，社会各界日趋安定祥和，充满积极向上的氛围。由此，施蛰存虽早已至耄耋之年，却仍“风流儒雅”地在中外古今各文学领域纵横驰骋，硕果累累，忙得不亦乐乎。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心中酝酿已久的是创办一本全面研究中国历代词学发展历程和各具特色的词人词作的专刊。其时利用各种机缘，施蛰存络绎不绝地向他熟悉的全国高校和学术界的词学名家夏承焘、唐圭璋、张伯驹、俞平伯等沟通交流他的办刊志向，均获得热烈响应。他的就职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出版社也已表示大力支持，而他自四十年代进入高校任教后进行词学研究所积累的大量文稿、资料又尽可刊用。对于办刊，施蛰存可谓老马识途、胸有成竹。他在三十年代为上海现代书局创办的《现代》期刊获得极大成功，曾被誉为中国二十世纪文艺界最为成功、最受读者欢迎的期刊。

《词学》创刊号出版于1981年11月。施蛰存像看待自己的著作一样对《词学》呵护备至，花费了大量心血和精力，对刊物的《创刊缘起》、征稿規約、编辑体例、栏目设置、约请作者、审阅文稿、选配图版等，他虽有名家和高龄之尊，但不避繁琐，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他为每辑目录撰写后记和读者交流，并编排目录，为入选文章撰写按语、附记，甚至计算文稿字数、批注字号、标明格式和繁简字体变换、审读校样等。他找出二三十年代使用过的英文打字机，将每辑目录译成英文附在书后，这在当时没有远大、犀利的国际交流意识，见不及此。

由于施蛰存博通中外古今和正直无私、广结善缘的崇高声望，全国最有影响的词学家均列名于编委会或作为主要撰稿人，词学大师夏承焘、唐圭璋也应邀与他同为主编，列名于他之前。在施蛰存的全面策划、苦心经营下，《词学》甫一问世，即在海内外学术界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中获得交口称誉，如潮好评。

第一辑“论述”栏名家名篇的开张即可谓气势不凡：《历代词学研究述略》（唐圭璋、金启华）、《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马兴荣），接连两篇夺人眼目。三位词学家数十年苦心研究的词学奥义和千年词学发展源流清晰明要地映现于读者之前。施蛰存在《编辑后记》中说，他特地安排的这两篇文章，对宋代以来直到现在的词学研究情况，作了颇为全面而又简洁扼要的论述，说明过去词学研究有哪些成果，指示今后的词学研究可以有哪些课题和门径。对于有志词学、正要入门的读者，这两篇文章，或可作为一堂导言课。

今年是徐志摩去世90周年纪念，作为一位徐志摩的研究者，我想在此回忆当年徐志摩研究会的三位顾问。

改革开放后，郭沫若、林语堂、丁玲等研究会纷纷成立。陈从周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现在各种研究会这么多，为什么徐志摩还没有？”终于在1996年，海宁当地政府酝酿成立徐志摩研究会，聘请赵家璧、孙大雨、卞之琳、陈从周和我为研究会顾问，并委托我返沪时把聘书转交给其他各位。我颇惭愧：这些前辈都为徐志摩的学生，或诗友，唯有我这个后生小子，居然也滥竽充数，混迹其中了。

卞之琳为徐师仗义执言

朱自清曾说：“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志摩的诗》和《女神》也被推为新文学头十年最好的两部诗集。卞之琳亦仗义执言徐志摩的“爱祖国、爱艺术、讲人道”，推举他的文学地位。我在研究卞之琳的诗及与他交往的过程中，才知道卞之琳原来是徐的学生。一次与卞谈十四行诗，我说你那首《望》特别好，尤其是前半部分，他笑了，说：“我在北大读书时，徐志摩教我们英国文学课，一次讲雪莱，发现了我写的《望》，就拿去了，我也不敢问，后来就在上海的《诗刊》上用我的名字发表了。我本想用笔名的，也来不及了，从此只好用真名了。直到如今。”后来陈梦家编《新月诗选》，也选了卞之琳的《望》等诗，并在《序言》中说：“卞之琳是新近认识很有写诗才能的人。他的诗常常在平淡中出奇，像一盘沙子看不见底下包容的水量。如《黄昏》，如《望》都

《词学》创刊之初，全国第一流词学家如夏承焘、陈兼与、万云骏、钱仲联、宛敏灏、饶宗颐、黄坤尧、张珍怀等均争相惠稿，深刻揭橥历代词学之谜及其发展历程，词籍的编纂及其疑难真伪，词人名家如何苦心孤诣地发展出各种手法营造氛围胜境。词学批评的多种形式如述评、词话、札记、丛谈、答问录、点将录等也都是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

在想方设法质疑困难，将历代词学长河源流的各个衍变发展阶段一览无余地展示给广大读者之余，施蛰存还功德无量地将记录词学各发展阶段的名籍佳槧，尤其是他北山楼中秘藏数十年的“枕中秘宝”公诸广大读者。如《词学》第一辑刊出的曾被晚清词学宗师况周颐称为“全明不能有二”的明代中叶著名词曲家陈大声的《草堂余意》；又如晚清著名词人陈庆森的《百尺楼词》，百余年来词学研究者无从查访，施蛰存据其北山楼收藏原稿刊于第四辑，为清词增加一家全集。唐代《船子和尚歌词》与张志和《渔父词》句法全同，且皆咏渔人生活而寓以释道玄理，久为后世所并称而不易见到，经施蛰存整理后，将其四十首全文首刊于第二辑。明代蒋平阶、沈亿年的《支机集》三卷是久已濒临亡佚的明末词学珍籍，词学研究者一向苦于寻觅，施蛰存将其接连刊出于《词学》第二、第三辑。中华书局印行的域外残本《永乐大典》面世后，施蛰存尽心将《全宋词》《全金元词》与其对照阅读二十余年，录得此二书共有二十首未收，遂以《宋金元词拾遗》刊于第九辑。施蛰存的日本挚友、东北大学词学名家村上哲见教授的《日本传习《漱玉词》二种》，详尽论述了我国流失的汲古阁未刻本《漱玉词》和《劳权手校道光刊本《漱玉词汇抄》，揭示李清照词在异国流传轨迹，在词籍学志学和《漱玉词》研究上均具有重要价值，他也于第九辑将其全文刊出。

《词学》中，“词苑”部分的专栏虽篇幅无多，却极受读者欢迎，常见各界来稿珠玉般琳琅夺目璀璨生辉。如其第三辑：“词苑”开篇即刊出国家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的《水调歌头·题千里嘉陵画卷》《西江月·访兴文石林洞乡》，以及以研究清词驰誉学界之著名词家周梦庄的《望海潮》，均意蕴深长，各擅诗技，弥足珍贵。

施蛰存的诗词修养极为全面深邃。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即以新诗创作的心理通感手法独具诗趣，别树一帜，八九十年代又以《唐诗百话》《北山楼诗》著称于世。他的词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他亲自主编的第一至十二辑上，如刊于第一辑的《读书庄词札记》，刊于第四辑的《读词四记》（论后唐庄宗《如梦令》、李后主《临江仙》、苏东坡

忆徐志摩研究会的几位顾问

孙琴安

是成熟了的好诗。”

不知是由于卞与徐有这样的师生关系，还是由于他也曾像徐那样热心输入和试验新诗形式的缘故，不少人谈诗，总爱把他与徐挂在一起，如朱自清就曾谈：“他试验过的诗体大概不会比徐志摩先生少。”李广田也认为：“卞之琳在技术或表现方法上，比徐志摩该是又进了一步。”冯文炳甚至说：“在我们讲新诗里头虽然没有讲徐志摩，并没有损失，卞之琳的文体完全发展了徐志摩的文体，这个文体是真正新鲜真有力量的。”而卞之琳也一直是把徐志摩视为自己诗路上的引路人，不忘师恩，在徐志摩逝世十周年之际，他奉上了《十年诗草》一书，扉页上写明是献给徐志摩先生的。

赵家璧为徐师整理遗稿

出版家赵家璧也是徐志摩的学生。早在光华大学附中读书时，他就爱好西洋文学，并主编《晨曦季刊》。升入光华大学后，他在《一本周刊》上发表了关于拜伦、济慈、但丁的读书札记，引起了在该校教英国文学课的徐志摩的注意，便约他来大学教员休息室进行交谈，从此成为朋友。赵每有什么问题，便来请教，徐志摩总能为他解惑，并鼓励他参观汪亚生画展，

《洞仙歌》、陈鹤斋《法驾导引》，刊于第六辑的《白居易辨》，刊于第八辑的《说〈忆秦娥〉》等。施蛰存的词论均以详尽确凿的资料予以犀利的辨析，因而论断极为清晰有力，如千百年来被称为“历代词曲之祖”的《忆秦娥》《菩萨蛮》的作者，历代相传为李白所作，词史上一向众说纷纭，施蛰存以冯延巳、张先、毛滂、向子諲、贺铸五首《忆秦娥》和苏轼《双荷叶》六首词与其对照辨析，指出“以上列举《忆秦娥》词六首，其格律演变之迹，岂不显然？由此可知‘箫声咽’一词，决不能作于冯延巳、张先之前。此必苏东坡、贺方回同时人所撰，谬其作者，因托于李白耳”。

以上所列举施蛰存词论多为论析唐五代词，近现代以来词学界之研究方向日趋宋、清二代，而施蛰存却轻车熟路地全面深入研究唐五代词，不以为难，可见其学殖深厚。又如刊于第四辑的《说〈杨柳枝〉〈贺新郎〉〈太平时〉》，刊于第七辑的《唐时宋词中的六州曲》，可见施蛰存深于词调、词律、词谱之学，因这些都是词学中的“冷门”，近现代词学家一般不轻易进入，而施蛰存却举重若轻，论辩有力，使读者服膺。施蛰存自《词学》第一辑起，即连载《历代词选集叙录》《新出词籍介绍》，第六辑又增刊连载《港台版词籍经眼录》，第七辑增刊连载《词学书目集录》，第九辑刊出《英文本词学书目》，这些都促使现代词学目录学、现代词学版本学获得积极进展。他在《词学》尽刊“北山楼词学珍藏”并作长篇详尽题解，也促使词学文献学日趋形成。

施蛰存词作于《词学》第三辑刊出《鹧鸪天·赋赠叶嘉莹女士》，于第六辑刊出《路莎莎·奉怀周梦庄先生兼题《海红词》》，于第八辑刊出《水调歌头·一九七二年，听《黄河大合唱》而壮之》，于第九辑刊出《减兰·葛渭君方校《阳春白雪》，乞吴藕汀作《丐斋校词图》，索题，因赋此》。这四首词风格各异，才情骏发，不事雕琢，寓情深挚，委婉清丽。其中三首怀人词一气流转，自然深厚，词致俊雅，《水调歌头》一首更见声情激越，笔力雄健，格调苍劲。

施蛰存一贯喜闻乐见中外文化交流，《词学》诞生在国门初开之年，施蛰存更是时时以此为念。他与港澳词学名家饶宗颐、罗忼烈、黄坤尧、黄嫣梨、施议对、林政义等经常互通声气，《词学》每期都会刊出国外词学名家的研究成果，如日本松浦友久的《关于越调诗的二三问题》、西纪昭的《苏轼初期的送别词》就分别刊于第一、二辑，村上哲见的《柳耆卿词综论》刊于第五辑，水原渭江的《敦煌写本《南歌子》舞谱之解读》刊于第七辑。他更把第九辑办成“海外词学特辑”，刊出美

国约翰·休斯、高友工、刘晚、孙康宜、加拿大叶嘉莹，日本村上哲见、泽普久和，韩国车柱环、池荣在等的最新词学研究成果，美国王璠玲的《英文本词学书目》也刊于此辑。美国林顺夫《中国抒情诗歌的转变》、孙康宜《中国词的演进》，加拿大方秀洁《吴文英与南宋词的艺术》，以及林玫仪《词学考论》作为“海外词学书影”刊于卷首。日本森川竹溪《梦餘词》、水原琴窗《琴窗词稿》手迹》也同时刊出。在施蛰存和《词学》的促成和推动下，美国、我国台湾及香港地区先后举办了词学研讨会，欧洲学界与高校也对词学逐渐予以关注，促使词学成为世界各文化艺术领域中的一门“显学”。

在立志研究词学之初，施蛰存便致力于将传统词学改造成现代学术，融入现代社会科学，以促成现代词学的诞生。创办和主编《词学》可谓一大好机缘，他也作了大量实践与尝试，荟萃其词学成就的北山楼词学体系奠基于《词学》，《施蛰存全集》中的第六卷《北山楼词话》得到社会和中外学界广泛认可和赞誉，并获得第十三届上海图书奖等多种荣誉。

施蛰存眼光远大，虑事周密，遇事开明，办事干练，绝不粘滞于物，而能与时俱进，疑窦难推，很好地融入于社会的发展，他在《〈词学〉创刊缘起》中说：“在迎接‘四化’，开展科学研究的高潮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文艺学研究，也相应地出现了提高和深入的前景。”他又在第一辑的《编辑后记》中说：“我们不自量力地创刊《词学》，怀有为词学研究重整旗鼓的心愿，妄想以这个刊物来开风气，藉藉以‘鼓天下之劲’。但望本刊问世之后，在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中，能产生良好的影响，号召更多的词人、学者，不论老年、中年、青年，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对古典文学的这一专业部门进行新的研究、整理和译介……我们为贯彻双百方针，追求真理，愿意将本刊向各方面持有不同观点的作者提供不同的论坛。本刊将不是词学研究的‘一言堂’。”他的远见卓识和慷慨博大的胸怀促使《词学》被海内外词学界广泛誉称为“中国词学界的一面旗帜”，并连续多年被评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施蛰存词学既邃，词功尤伟。他高瞻远瞩、苦心孤诣地创办和主编《词学》所留下的各种规范和先例，早已形成良好和优秀的传统，使我们倍感亲切，足以垂裕后世，让我们思念不已。

（本文写作过程中采访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与创社的百岁编辑施亚西先生等，谨深致谢！本文标题引自唐李商隐《筹笔驿》）

不全，直到1983年，赵、陆在五十年前编纂的《徐志摩全集》才得以问世。此套书较台湾本更为完备，还有赵家璧所撰序言。高寿的他不仅看到了恩师全集的出版，也见证了徐志摩研究会的成立。

陈从周为徐志摩撰写年谱

对成立徐志摩研究会最为关切、奔走呼吁次数最多的，当属陈从周。陈从周是同济大学教授、园林大师、书画家，同时也是重要的徐志摩研究专家。其妻蒋定乃是蒋百里的侄女，徐志摩的表妹。作为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对徐志摩非常敬重，早在1949年，就撰写出版了《徐志摩年谱》，为后人从事徐志摩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笔者三十五年前听《徐志摩传》时，经常去他家，听他谈有关徐志摩的各种佚事，同时也说起此书的帮助之大。他也曾十分得意地对我说：“幸亏我在当年写了本《徐志摩年谱》，自费出版，许多人和实物都在，保留了一些资料，如果现在来写，许多人和实物都没了，根本就写不出。”并鼓励我大胆研究。

1965年，陆小曼临终前，曾把《徐志摩全集》的全部清样和纸型，以及遗物，委托陈从周保管。陈从周千方百计地保护好这批遗稿遗物。海宁西山本有徐志摩墓，“文革”后，由陈从周重新设计，修复一新。当得知我的《徐志摩传》即将出版，陈从周特意赋诗一首：“世事沧桑六十年，已盈白发上华颠。遗闻佚史搜堪尽，含笑犹君在九泉。”后来，我把他的手迹作为书的封面，以示感谢。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讨论海派文化问题，必然涉及广与狭、名与实、新与旧等问题，也必然涉及时代特点问题。

先看广与狭，即广义海派与狭义海派问题。

海派文化自近代形成以来，一直伴随着讨论。粗略回顾一下，大的讨论凡四次。这些讨论，从总体上看，是沿着从狭义海派到广义海派的逻辑展开的。

第一次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戏剧界围绕海派京剧的讨论。晚清末年，上海等地出现海派京剧，其表演特色颇引发了一些争议。1926年，《新闻报》刊发复旦大学马凡鸟的文章《论联弹非创自海派》，对海派京剧作了正面评价，认为海派京剧所采用的调子联弹等表现手法，是京剧史上的一次进步，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应当予以肯定。十年后，戏剧学家张庚发表《旧戏中的海派》，对海派京剧的艺术特点、社会反响作了系统梳理与清晰论述，认为海派京剧是一种新的市民戏剧，在戏剧史上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改变。

第二次，1933年至1934年，围绕海派，争论再起，涉及的刊物至少有14家，文章至少有38篇。这次争论，后因全面抗战爆发，两地文化人的生活环境发生巨变而逐渐淡化，不了了之。

第三次，1947年至1948年，进步学者夏康农和杨晦等发表数篇文章，积极评价海派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价值和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夏、杨等人已从文艺、文学界，联系到新文化运动，扩展到整个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历史传统与文化特质，他们笔下所论述的海派文化，已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上海城市文化。夏、杨学养均极丰厚，立场亦比较超然，所论比较公允。

第四次，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八十年代中后期，上海讨论城市发展战略，思想文化界相应地讨论上海文化发展，提出“重振海派雄风”的问题，引发了对于海派文化持续数年的讨论。这次讨论，实质上延续了夏康农和杨晦的思路，所论海派，虽然对于文艺、文学等多所涉及，但已不限于此，而包括整个上海城市文化，诸如商业文化、市民文化、革命文化、左翼文化、红色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等。

再看名与实的问题。所谓城市文化，正像城市学家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一书中所展示的，是包括通过城市所展示的人类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在内的综合汇聚体：“在城市这种地方，人类社会生活散射出来的一条条互不相同的光束，以及它所焕发出的光彩，都会在这里汇集聚焦，最终凝聚成人类社会的效能和实际意义。”近代以来对海派文化的讨论，沿着艺术（美术、京剧）、文学，再后来扩展到整个城市文化，包括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这是由狭义到广义的合乎逻辑的自然延伸与扩展，因为无论艺术还是文学，其主体都是人，其行为都与人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密不可分，其活动空间都是城市，与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国际联系密不可分。

从名实角度看，前面所述海派广阔问题，实质上也是名实问题，因为无论广义海派还是狭义海派，都是海派之名，只不过是不同范围之名而已。

2015年，上海“十三五”规划指出，上海要“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吸收世界文化精华、弘扬海派文化品格，着力提升核心价值观感召力、理论成果说服力、宣传舆论影响力、文化产业竞争力，基本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2017年，上海提出要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丰富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是上海的宝贵资源，要用好用足”。这里所说的“海派文化”，便是广义的上海城市文化，也是从实质的层面对海派文化的再定义。

以此定义来回溯近代关于海派文化的讨论，可以认为，近代海派文化之实，要远远大于美术界、戏剧界、文学界当时所讨论的具体的“海派”范围，理所应当包括当时上海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审美情趣，应当包括当时上海的商业文化、市民文化、革命文化、左翼文化、红色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等在内。抗战胜利以后，夏康农和杨晦等人之所以能够跳出部分文化人而论“海派”的藩篱，正在于他们能够以宏大的、长远的眼光，追根溯源，由艺术、文学等观念形态的文化扩展到产生此类文化的经济基础与城市特质，冷静地、理性地思考海派的价值。这也是我们能够在新时代顺理成章地提出“弘扬海派文化品格”的底气所在。

最后看新与旧的问题。由于海派文化在近代有个得名、污名与正名的过程，所以，现在有些学者主张将海派文化分为旧海派与新海派，以示区别。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海派文化如同其他地域文化一样，自有其时代性，包括断裂性与连续性，自有其内在演变逻辑，不必人为地强加分隔。

近代海派文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中西文化广泛、频繁、密集交流，而哪一种文化都不占绝对优势的文化态势下，在全世界独一无二

海派文化的名实与新旧

熊月之



理格局下，以流动性极大的移民人口为主体，以及基于以上诸因素所形成的上海社会自发秩序，以江南文化为底蕴，吸收了近代西方文化一些元素，形成的上海城市文化。近代、当代上海城市所体现的开放、创新与包容的品格，在近代以前的广大江南地区都已丰富的、悠久的存在，近代上海移民人口八成以上是江南人。海派文化的底蕴就是江南文化。

1949年以后，上海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与城市功能均发生巨变，特别是在国际两大阵营冷战态势下，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上海与国际、国内的联系方式、流通渠道，上海城市发展的外部环境 with 动力机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近代意义上的“海派”已失去了原先存在的土壤，“海派”的声音也归于沉寂。但是，这并不等于海派文化全然消逝了，而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

比如，计划经济时代，上海高扬的“全国一盘棋”的口号，上海为国家做出的工业生产、科技创造、财政税收等方面的突出贡献，就体现了海派文化中的担当精神。五十年代的西迁精神，六十年代的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中，也有海派文化的成份。近代上海广为时人称道的法治意识、契约意识，在计划经济时代，表现为上海大中型国有企业不折不扣地完成国家的生产计划，表现为上海居委会等基层组织高度的执行力，表现为上海社会管理的高度有序。市民文化中的精致品格，表现为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尽可能生活得有品位，像市民自己制作家具、假领头、半两粮票等，是海派文化的长项，而不是短处。

改革开放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海的开放传统逐渐恢复，海派文化被赋予新的定义，也有了新的内涵。

任何城市文化都有时代性。对新时代的海派文化特点的归纳，需要处理好文化与精神或品格之间的关系。对于上海城市精神与城市品格，我们已经有了广为人知、广泛认可的概括，即“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与“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已经概括的上海城市精神与城市品格，是高度一致的。城市文化与城市精神品格，是文与质的关系，是行为与灵魂、表象与实质的关系，文较质更为多样、灵活，质较文更为核心、稳定。

针对新时代上海城市文化的特点，可以在城市精神特点之外，再强调三点，即担当、精细与精致。这些，在近代、计划经济时代的海派文化中，都有充分表现。在当下，再强调这些，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强调担当意识，意在突出上海代表国家参与世界竞争，突出先行者、领头羊的角色，也与近代上海建党精神相呼应，与红色文化相呼应；强调精细，意在突出上海城市管理之善，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成就显著，地铁、空港管理卓越，这些都是精细的表现；强调精致，意在凸显上海环境优美，生活有品质，社区有温度，建筑可阅读，宜居、宜业、宜游。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史馆研究馆员）